

回首“文革”（下）

张化，苏采青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责任编辑:萧淮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首“文革”张化,苏采青主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9.12

ISBN 7 - 80136 - 337 - X

.回... . 张... 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 研
究 - 文集 D65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1685 号

回 首 “ 文 革 ”(共四卷)

张 化 苏采青 主 编

郑 谦 王寅城 副主编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通讯处:北京 9723 信箱 邮编:100029

地址:北京朝阳区安外小关东里 10 号院(北门 10 号楼)

电话:(010)64946059 传真:(010)64968014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北京书林印刷厂

850 × 1168 毫米 32 开 48 印张 940 千字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3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80136 - 337 - X K·297

定 价:108.00 元(共四卷)

目 录

上

历史经验是宝贵的财富(代序)	胡 绳(1)
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的“左”倾错误	胡乔木(6)
介绍和答问——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 历史问题的决议》(节录)	邓力群(16)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节录)	胡 绳(34)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与党史研究(节录)	龚育之(39)
对“文化大革命”几个问题的认识	郑 惠(65)
关于“继续革命”的几个问题	龚育之(95)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席 宣(113)
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权利”和 毛泽东对它的误解	石仲泉(126)
关于“文化大革命”起因的探讨	席 宣(142)
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误区与“文化大革命” 的发动	林蕴晖(168)
《五·七指示》初探	王禄林(185)
“文化大革命”和平均主义	席 宣(201)
“左”倾理论与对社会主义曲折认识的关系	杜 蒲(223)
当代社会主义改革与中国的“文化	

大革命”(节录)	郑 谦(243)
毛泽东防止和平演变思想的形成(节录)	李 捷(260)
试谈毛泽东对当代国际共运形势的判断	
和“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谭 凝(266)
国际共运对我党的消极影响(节录)	王福如(280)
不能把“文化大革命”产生的原因简单地	
归结于封建主义	柳建辉(289)
“文革”前的几场文艺风波	林默涵(305)
从学术讨论到“文化大革命”	吴冷西(319)
《二月提纲》和东湖之行	龚育之(330)
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产生前后(节录)	刘志坚(371)
“文化大革命”中的社会性矛盾	印红标(413)
“两个文革说”与“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研究	金春明(429)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经济情况分析	李成瑞(447)
十年动乱中经济体制的变动	(470)
七十年代初期我国经济建设的冒进及其调整	阎放鸣(511)
七十年代前期的中国第二次对外引进高潮	陈东林(536)
“文化大革命”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	关海庭(553)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政治体制	郑 谦(573)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军事工作	(594)
“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的经济思想探析	陈东林(609)
从印制“大字本”古籍看毛泽东晚年的思想	
和心态	刘修明(633)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特点及其	
主犯的刑事责任	余叔通 何秉松(661)
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王年一(673)

一部简明而有深度的史书

- 《文化大革命“简史”》评价 郑 惠 张 化(706)
- 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 李雪峰(710)
- 评《五·一六通知》 谭宗级(730)
- 关于工作组存废问题 穆 欣(753)
- 回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五十天路线错误”
- 从“6·18”事件到“7·29”大会 李雪峰(774)
-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评述 贺 源 张沅生(803)
- 红卫兵运动述评 印红标(831)
- “文革”初期三个回合的斗争 苏采青(875)
- 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王年一(916)
- 从清华大学两派看“文化大革命”中群众
- 组织的对立和分歧 唐少杰(935)
- 对上海“一月革命”的几点看法 王年一(953)
- 正义的抗争——所谓“二月逆流”的前前后后 ... 曾 涛(969)
- 试析“三支两军”的实践活动及其客观作用 赵国勤(989)
- 刘少奇的悲剧与悲剧中的刘少奇 张 化(1002)
- “刘少奇专案组”始末 黄 峥(1021)
- “革命委员会”始末 关海庭(1040)
-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原因及评价 (1057)
- 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结果 李丹慧(1077)
- 九大评述 金春明(1105)
- 略论党的九大后的整党 金春明(1117)
- “斗、批、改”运动与一种社会主义模式 郑 谦(1135)
- 1969年前后党对外交战略的重大调整 张保军(1162)
- 九大至九届二中全会前夕毛泽东与林彪的

分歧和矛盾	刘志男(1180)
关于林彪的“第一号令”	苏采青(1202)
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	吴 德(1212)
毛主席在粉碎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的日子里 ...	汪东兴(1249)
“九·一三”后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	
思潮的斗争	安建设(1279)
十大评述	谭宗级(1301)
“批林批孔”运动	王海光(1317)
围绕“风庆轮问题”的一场斗争	苏采青(1341)
“组阁”之争	力 平(1372)
邓小平与 1975 年的全面整顿	张沱生(1384)
当代中国文艺史上特殊的一页	
——1975 年文艺调整述论	夏杏珍(1403)
1975 年整顿中的三个著名文件	程中原(1426)
共和国历史性转折的发端	
——从全面整顿走向十一届三中全会	张 化(1451)
四五运动述评	金春明(1471)
“四人帮”覆灭记	范 硕(1497)
后 记	
	(1523)

“刘少奇专案组”始末

黄 峥

在“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专案组”采取弄虚作假、刑讯逼供等恶劣手段伪造证据，于1968年9月炮制出三本所谓“罪证材料”，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刘少奇打成“叛徒、内奸、工贼”。设立这个专案组，既没有中共中央的文件，也没有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议，更没有通过中共中央全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那末，这个“专案组”究竟是怎样成立起来的呢？它都干了些什么呢？

—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刘少奇受到批评，不再参与中央领导工作；10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全国开展了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但在这时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许多事实证明，毛泽东仍把刘少奇作为党内问题和人民内部矛盾对待，并非要打倒刘少奇，也

没有要对他立案审查。

1966年11月3日，在接见红卫兵的群众大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特地走到刘少奇跟前，询问了他的工作、生活情况。当刘少奇表示要到群众中去接受锻炼时，毛泽东说：你年纪大了，就不要下去了。这一情景，通过电视传播到了全国。1967年1月初，北京建筑工业学院两派红卫兵组织几次“勒令”刘少奇到该院检查。毛泽东获悉后派人转告刘少奇不要去。1月13日，毛泽东把刘少奇接到人民大会堂谈话，要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1月17日，毛泽东在会见一位外国党的领导人时的谈话中还称“刘少奇同志”，并且说：“刘、邓是不是能选上（按：指中央委员），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2月12日至18日，毛泽东在同张春桥、姚文元的三次谈话中讲到：刘少奇看来九大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

毛泽东什么时候改变了不打倒刘少奇的态度呢？根据现有材料分析，作出这一决定的时间大约是1967年3月。

3月16日，毛泽东同意在重印《毛泽东选集》时删掉原有赞许刘少奇的一段话。同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印发了关于61人出狱问题的材料，在批语中用了“刘少奇策划和决定”、“刘少奇、张闻天这个叛卖的决定”等严厉的字眼。3月21日，毛泽东同意调查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在这段时间里，戚本禹的批刘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

在最后一稿中增加了攻击、责问刘少奇的“八个为什么”，称刘少奇为“假革命、反革命”。这篇文章经毛泽东批准，于3月30日公开发表。

是什么促使毛泽东改变了对刘少奇的态度？主要是两个原因。

首先是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阴谋陷害。林彪、江青集团中的骨干分子，几乎都是靠反刘少奇起家 and 攫取高位的。他们当然不愿意继续保留刘少奇的任何职位，从而对他们的政治地位和野心形成威胁。同时他们懂得，不经过毛泽东，打倒刘少奇是不可能的。于是，他们借用群众揭发和专案工作等名义，竭力对毛泽东施加影响。

早在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尚未结束，叶群于8月11日、12日两次找人口授诬陷刘少奇的材料，要他写成书面揭发。13日，林彪看了写出来的材料。14日，林彪在家里找这个人谈话，要他把书面揭发改成向林彪、毛泽东写信的形式上报，并说“这样更政治化些”。当天，林彪就把这封信和诬陷刘少奇的材料批送江青，要她“酌转”毛泽东。

在诬陷刘少奇的阴谋活动当中，康生是一个十分毒辣的角色。1966年8月13日，由康生妻子曹轶欧出面向中央一位领导同志写信，揭发王光美的所谓问题，并攻击刘少奇包庇王光美。这封揭发信在部分中央领导同志中作了传阅。9

月16日，康生亲自给毛泽东写信，重提1936年薄一波等61人经组织决定出狱一事，并说什么“少奇的决定，就使这些人的反共叛党合法化了”。康生阴险的这一招，使毛泽东把刘少奇和整个干部队伍的问题看得更加严重。

在“怀疑一切”极左思潮的影响下，群众中也捕风捉影地揭发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许多造反派、红卫兵组织把那些道听途说、张冠李戴的事情郑重其事地整理上报。林彪、江青等人利用这一情势，有计划、有预谋地将这类材料择要报送毛泽东，有的在一定范围内印发、传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形形色色的揭发材料，包括说刘少奇几次被捕叛变等假材料，源源不断地通过各种渠道摆在了毛泽东的面前。

从毛泽东以后的多次谈话看，在这些连篇累牍的材料中，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所谓被捕叛变问题，终于促使他从根本上改变了对刘少奇的看法。后来他在接见外宾以及内部谈话中，在讲到刘少奇问题时，一再说“那时还不知道他的历史情况”，是“我们红卫兵现在查出来的材料”，并多次讲了“被捕叛变”的例子。

其次，随着“文化大革命”局势的恶性发展，1967年以后，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各地造反派纷纷抢印夺权，派性恶性膨胀，局势混乱不堪。毛泽东虽然采取了命令解放军“三支两军”、号召大联合、停止大串连等一系列措施，但未能奏效。

1967年2月发生了谭震林、陈毅、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拍案而起，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所谓“二月逆流”事件。同时，所谓“向走资派夺权”的部署在全国各地引起干部群众的不满，受到普遍抵制。毛泽东既然在全局上坚持“文化大革命”，当然不能容忍这种行为。他认为刘少奇虽然被批判了，但运动遇到了“刘少奇代理人”的抵抗，“从上至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现象”。这样，为了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击退所谓的复辟逆流，为了通过“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来克服派性，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全国性的动乱，于是一错再错，把刘少奇作为靶子，彻底打倒。

林彪、江青一伙在“倒刘”问题上起了极为卑劣的推波助澜作用。他们除了不断向毛泽东递送诬陷材料外，还利用各种机会煽风点火，在社会上制造“倒刘”舆论，使之成为既成事实。

1966年12月18日下午，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召见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指使他发动“倒刘”行动。12月24日，戚本禹在北京矿业学院宣称“刘、邓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2月26日，康生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时，公然将刘少奇称作“赫鲁晓夫”。蒯大富从张春桥那里领受旨意后，于12月25日发动“打倒刘少奇”的大规模行动，率领数千人到天安门广场召开“誓师大会”，又

分几路到北京主要闹市区广播、演讲、散发传单，大量张贴“打倒刘少奇”、“和刘、邓血战到底”的大字报、大标语，并且醒目地贴到了天安门城墙上。12月27日，北京高等院校造反派在工人体育场召开“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在社会上刮起了一股“倒刘”狂潮。

与此同时，江青等人有意发动各方面力量加强“倒刘”舆论。12月30日，江青、王力、关锋、姚文元到清华大学，对蒯大富表示“坚决支持”。12月31日，江青单独召见刘少奇的女儿，策动她起来造父亲的反。在戚本禹的直接指使下，从1967年1月1日起，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多次去刘少奇住处骚扰、围攻、批斗。1967年1月4日，康生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把准备好的一卷刘少奇讲话材料交给蒯大富，要他“回去后组织批判”。蒯大富回校后即组织人马贴出了大量批刘大字报。1月6日，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将刘少奇、王光美骗出中南海，并将王光美绑架到清华大学，随即又在社会上大肆宣传了这次所谓“智擒王光美”事件。1月9日，谢富治在接见全国公检法系统赴京代表时，号召“全国政法战线立即行动起来，向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刘少奇、邓小平开火”。

由于江青等人的策动，到1966年底、1967年初，“倒刘”活动蔓延到全国，并且愈演愈烈。毫无根据地攻击、丑化刘少奇的行动到处出现，全国已经形成了“打倒刘少奇”

的舆论环境。

对刘少奇进行专案审查，就在这种种复杂背景下开始了。

二

1966年冬，在极左思潮泛滥的情况下，“倒刘”气氛日浓，社会上冒出了一些揭发刘少奇、王光美有所谓“历史问题”的材料。在12月的一次中央碰头会上，议论了这些情况并提议组织班子进行审查。但当时刘少奇还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因此不便直接设立审查刘少奇的专案组，决定先设立王光美专案组。大约在12月15日至18日之间，拟了一个“王光美专案小组领导成员名单”。这份手写的字迹潦草的名单侥幸保存了下来。它既没有标题，也没有日期，更没有注明是在什么会议上、由哪些人研究决定的。然而，就是这份无头无尾的名单，成了设立“王光美专案组”的依据。名单全文如下：

谢富治（组长）

江 青 汪东兴

萧 华

叶 群

伯 达（顾问）

据当事人回忆，名单中江青换成汪东兴，是江青出于某种原因自己提出来的，要陈伯达当顾问，是林彪提议的。从字迹看，圈掉江青、添上汪东兴，是林彪的手迹，“伯达（顾问）”几个字则是陈伯达所写。这两处的字体和其余名字字体不一样，显见是后来所作的增改。在这份名单的上方，还写有“王光美专案小组领导成员名单 1966.12.18. 富治同志交来”字样，这是专案组管理档案的工作人员标上的。

领导成员确定后，从军委办公厅、公安部等单位抽调了4名工作人员。1966年12月18日晚，由谢富治、汪东兴主持，在中南海西楼一个小会议室召集抽调来的人员开会，正式成立专案组，当时宣布“名称暂叫中央办公厅丙组”。谢富治在会上说：“中央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审查王光美。”他拿出上面介绍的那份专案小组领导成员名单，交给专案组，要他们好好保存。

1967年3月，刘少奇问题明显升级。3月9日、10日，陈伯达、康生在部队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点名对刘少奇从历史到现实进行了系统的批判。3月21日下午7时半，毛泽东、林彪等中央政治局常委接见与会人员后，留下来议论一些问题。议论中对有人提到“刘耀祖案中涉及刘少奇在1929年叛党嫌疑问题”作了研究，决定把这方面的材料交丙组专案办公室即“王光美专案组”调查研究。据戚本禹回

忆，这项工作当时指定由康生分管。

这次议论没有记录，后来也没有形成文件。康生似乎对这种方式有点心虚而这件事又归他分管，所以事后他让工作人员手写了一分备案性质的“关于专案问题纪要”，其中说：“汇报中涉及到有人控告××自首叛变和刘耀祖案中涉及刘少奇在1927年叛党嫌疑问题。共同研究之后，决定：“关于刘少奇1925年在长沙被捕、1927年叛党嫌疑及1929年在沈阳被捕等材料，交丙组专案办公室调查研究。”康生亲笔在最后注了一行小字：“1967年3月25日林彪、恩来、伯达、康生都看过”。

这份手写的不伦不类的东西，就成了对刘少奇进行专案审查的依据。

据参加过刘少奇专案工作的萧孟回忆，1967年夏有一次他问康生：设立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有没有文字的批示？康生说，毛泽东在西郊机场接见红卫兵时他曾汇报过，并写过一个备忘记录交给了中央办公厅负责人。现在分析，康生所说的“备忘录”，就是这份“关于专案问题纪要”。

需要指出的是，这份手写件表明，当时只是决定把有关材料“交丙组专案办公室调查研究”，并没有提出要成立刘少奇的专案组，但康生、江青等人在后来的实际操作中却设立了一个相当庞大的“刘少奇专案组”。

这个专案组的名称很混乱。1966年12月刚成立时叫

“王光美专案小组”，对外叫“中央办公厅丙组”。1967年3月康生在那份“备忘录”中又把它叫作“丙组专案办公室”。1967年5月中旬，谢富治向“丙组”人员宣布，丙组改为“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对外叫“五四组”，组织上归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领导。在专案组的文件中，也是几种名称混用，有时单独用“王光美专案组”或“刘少奇专案组”，有时用“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或“刘、王组”。

这个专案组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对刘少奇定案后继续存在，大约到1973年6月后才结束。这期间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虽然专案审查刘少奇从1967年3月已正式开始，5月以后进展加速，但一直到1968年4月中旬以前，关于刘少奇案情的各种请示报告仍用“王光美专案组”的名义。1968年4月下旬起才用“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的名义，这可能也是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心虚的一种表现。

专案的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变动更大。1966年12月刚成立时领导成员中有萧华，萧华不久遭到诬陷迫害，当然也就不可能再参与其事。1967年9月11日，谢富治亲笔写了一个便条，里面说：“王光美专案成员于下：江青、谢富治、戚本禹、汪东兴、叶群组成王光美专案小组。”这里所说的“王光美专案小组”实际上已经是“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

究竟多少人参加了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的工作？现在已经难以准确统计。专案组的机构几经改组、扩充，人员也就一再调整、增加。1966年12月刚组建“王光美专案小组”时，只有几名相对固定的工作人员，以后陆续增加到数十人。工作人员中经常有人调进调出，有些人只参与了某一项工作或一段时间的工作。有一个时间，在专案组正式机构之外还建立了若干个“外围组”，担负一些次要工作。至于从一些省、市、地方部队和红卫兵组织中抽调人员配合工作或参与一部分工作的，那就更多了。例如集中关押该案嫌疑犯的北京第二监狱，一次就从军队借调了100多名干部作审讯工作。为查所谓“1929年刘少奇在沈阳被捕叛变”的证据，光沈阳一地就组织了400人的“彻查队伍”查阅敌伪档案，结果一无所获。

专案工作人员中有些人因不被信任而调离，有的甚至被关押坐牢。1967年11月，谢富治下令将公安部抽来的人全部撤出，另从军队调入一批干部取而代之。曾担任专案负责人的萧孟，被江青点名批评，于1967年11月被逮捕入狱。

尽管专案人员有很大变动，但这项工作一直处在江青、康生的操纵之下，前台的直接负责人则主要是谢富治。

1968年2月22日，谢富治在专案组的一份报告上批道：“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